

批评也要温度

□李国平

讨论当代文学、当代批评,不能无视基本,应该有大参照。讨论“锐批评”文丛,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。《文艺报》在1月3日“书香中国·锐批评文丛”的导言部分,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:“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,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。”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:“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、表演、研究、传播,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,服务人民,取得了显著成绩,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这个总体评价、论断,是源于文学的历史现实的,是对新时期文学经验、成就总结的产物。如何解读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?如何解读新时代的降临和文学面对新时代的课题?如何在积极论的基础上发现问题,助推一种多样的、健康的文学生态和批评环境?我认为,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作家出版社抓这套文丛的整体思维,培育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,倡导百家争鸣的氛围,是这套文丛原初的也是会衍生出来的效应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。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为我们打开了视野,给创作和批评提供了多维的空间,启迪或者更新了我们的思维,培育了我们的知识谱系,提供给我们进行批评的思想资源和参照背景。是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,助推了文学生产力。如果我们稍有历史感,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,文学、文学批评都享有充分的开放性,从来都不缺问题意识,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思潮,都是经历了讨论、质疑和辩难的,都是在汲取积极营养和资源的基础上前行的。文学批评也呈现出多级的形态,“锐批评文丛”所呈现出来的批评方式,构成了当代批评的一个维度。通过文学批评表达的当代文学的关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,一种方式并不构成对另一种方式的否定。

评估一套丛书,人们会考量它的整体质量,评价一篇文章,人们会从表述方式中探究它的思维方式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,很多当时吸引眼球的言论,后来再读,却黯然失色。对于具有自省精神的作者来说,也是懊恼大于兴奋。很多现象,无视基本、缺少整体观、以偏概全简单化,唯我占有真理,别人都是错误解读和错误判断,不能接受历史和学理的考量。这套文丛无疑有它的积极面,敏锐、敏感,具体指陈、坐实性批评。我更在独立思考、质疑精神、批评勇气的维度上肯定它,但在整体性思维、总体论把握方面还有欠缺。“文丛”中一部分文章,仍然饱有学理的生命活力,还有一些已难读出思想的力量。相反,一种绝对论、唯我论的思维方式应当反思和警惕。当代文学有许多低层面的、消极的现象,应该批评,但我们必须意识到,当代许多优秀的作家,他们的思维和我们处于同一层面,谦卑不必要,但傲慢也不可取。批评者应该开阔自己的视野,提升自己的学理素养、加大思想力度,而不要偏执于一元论、唯我论、绝对论。

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形成了一些传统,虽然有些传统还很脆弱,但值得珍惜。我不会幼稚地认为质疑精神、问题意识不应提倡,但以光明为建设的传统更应珍惜,在文学进步的这个宏观层面上如何把握阳光和阴影的关系,在思维方式的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冲突中如何建立总体性认知,在批评思维的整体性方面如何建立或者提升格局,这是我从这套文丛中读出的东西,坦率地说,有不满,有失望,也有启迪。

“为己”的写作与限度意识

□岳雯

对于我们这些以写批评作为职业理想的人来说,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向我们提供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:

第一,这套批评丛书建立在“破”的基础上,即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评论工作所提出的要求——号召批评家要做“烂苹果”的工作,“把烂的剜掉,把好的留下来吃”。丛书的作者毫无疑问都是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家。但是,“破”是建立在“立”的基础之上的。这么说的意思是,这些批评者对于一些文学现象、一些文学作品有批评性意见,但同时,他们更有建设性的意见。他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文学的理想所在。破除一些东西,不仅是为了拆除,更是为了建设。比如,李建军在《超越消极写作》中,批评了“消极写作”这样一种“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”,认为“消极写作”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,是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的写作,是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,是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。是为“破”。与此同时,他大量的文章,积极呼吁和建构“积极写作”。“它把文学当作与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视野,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;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,教会人懂得优雅、得体、高贵和尊严,而不是蛊惑、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。它也写丑恶,但不美好做底子;它为黑暗,但以光明作背景。它有稳定而可靠的道德基础,强烈地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,因此,无论遭受多么严重的挫折和不幸,它从不徒逞一时之快地逃避崇高,否定道德,诅咒生活,从而贬低人类的尊严,它任何时候都信守写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,那就是怀着温柔的善意,向人类和世界表达祝福的情感。”这一段带着崇高感和抒情性的话语分明是批评家对自己的期许。当我们看到一个批评者的著作遍地荒凉的时候,我们应该同时看到,在他的精神图景里,庄严的大厦已然建立。

第二,这套丛书的作者们有着宽广的问题域,他们的文章,以及文章里所讨论的问题,都是位于这一问题域里,互相联系,构成一个整体。他们并不是游击队员,东打一枪西放一炮,而是在自己的问题视野里谨慎地选择言说对象。他们十分清楚,你言说谁,其实都是言说自己;你彰显什么,你批评什么,这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了你自己。比如,对于何英来说,她关注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精神现实,关注女作家的创作,关注散文创作。这构成了她的现实问题域。她讨论许多作品,都是从自己的问题域出发,从这个意义上说,当我将批评者所讨论的作家虚化,他所关注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;当我们将问题坐标化,然后连成线,一个批评者的精神肖像由此呼之欲出。

第三,在这套丛书的文章背后,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。一个说着大家都说的“黑话”,没有自己独特声音的批评者其实是很难建立作为一个“人”的形象的。在这套丛书里,这些作者都有自己的腔调,都是在用自己的嗓子说话。他们真实地打开自己,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喜欢什么,不喜欢什么。在这些喜欢与不喜欢背后,是对文学最根本的热情。这热情让我感同身受,也让我产生了对他们的亲近之心。这就是批评者作为“人”的魅力所在。

通读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,也促使我去思考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常常面对的问题。首先,是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越说越糊涂的话题。批评者是作者的“判官”么,还是“粉丝”。当然,大多数人将之形容为同等位置的竞跑者。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。对于我个人来说,做批评,可能“为己”的成分要远远大于“为人”的成分。我无意于探究我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是否符合作家的“原意”,倘若有所谓的“原意”存在的话。我写作,只是为了把我自己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整理清楚。通过文字整理自己。批评这一文体并不是我自卑的来源,事实上,批评本身也是写作,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等诸种文体一样,只是写作的不同门类而已。我们希望通过写作给这个时代留下一点自己的思考,那就很好了。因此,“为己”的写作,对于我而言,可能更有意义。此外,在写作之时,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限度。这么说,是因为,写作过程中常常会被自己的幻觉所支配,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就是真理所在。但事实上,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。意识到自己的边界所在,意味着在写作之时就会不断反省。有反省,才会有不断的进步。

文学批评要讲真话、抒正气

□任美康

有人建议漫画应拓宽想象,别只是嘲讽,也可以表扬。所言是高见,但不会采纳。依我的偏见,一幅不辱没漫画名节的漫画,来到这个世界,就应该是满不在乎的、浑身长刺的样子。表扬不漫画,漫画不表扬。就好比,喝酒不开车,开车不喝酒;唱歌不跳舞,跳舞不唱歌;当官别发财,发财别当官。世上许多事,分开弄,没问题;同时搞,要出事。所以,去年恢复封三漫画,依旧说三道四,就为保障刊物从皮到瓤的配套。如果说,《文学自由谈》聊以自慰发出过一些光亮,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,无疑是刊物队列中最为耀眼的蜡烛。

很久以来的文学评论,得到一种虚幻的重视,分量似乎与文学创作平起平坐,被看作车的两个轮子,鸟的

一双翅膀。比喻动听,但显然过时,就连低档的老年代步车,早已四轮飞驰。被高抬的批评,其实从未享受过正常的对待。仅拿投入来说,不及创作的一个零头。如今,文从隆重面世,“文学批评”四个字,货真价实地有了扬眉吐气的气象。这是作家出版社令人刮目相看的出版项目。此外,对这套书的作者的选定十分讲究。何英,从很远很远的西北,得到编者的青睐;陈冲,从更远更远的远方,重返我们的怀念。此外,单从唐小林受到厚待、光荣入选,我们也理应对应这套文丛致敬。十位作者中,唐小林是唯一没有公职身份的打工者。仅仅翻阅他“呐喊”的目录,看其“修理”的对象,就可以感受到写作者的担当和勇敢,同时也更能领略到出版人的良知与洒脱。



「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」

文学批评应对“新时期文学”起到建设性作用

□李云雷

我觉得文学批评应该促进文学新时期的到来,这是文学批评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因为我们国家整体上虽然进入了新时代,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和社会同步进入了新时代,还有很多以前时代的传统思维和方式,需要不断地改变观念,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学问题的讨论,首先改变文学观念,然后再推动社会思潮的转变,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,就像在新时期之初起到的作用一样。

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确实非常好,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批评家很多有风骨、有力量、有筋骨。因为时间有限,我重点看了三本书,就是刘川鄂的《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》、洪治纲的《偏见之辞》和李建军的《当代社会分层与文学价值批判》。读这几本书的时候,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比如《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》,其中对池莉的批评是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,研究这样一个重要作家的发展脉络,对她的优点和不足研究得特别透,文章中指出了池莉书中有一百处硬伤,我们可以看出批评家的真功夫,不是表面的印象式的对作家进行批评,而是在做过深入的研究之后才做出的,并且以摆事实、讲道理的方式表达出来,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种方式。一方面是对具体作家的批评,另一方面刘川鄂也有建构的部分,书的前面关于人民性、关于底层文学、关于民间记忆的思考都很深入,让我们看到作者并不是为批评而批评,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学理和深

人研究的基础上的。洪治纲的《偏见之辞》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得特别好,比如那篇写短篇小说的《短篇小说,或一些问题》,在整体性的世界视野中,一方面指出作家的优点,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具体作品的一些不足。把优点和不足结合在一起来说,态度很鲜明,立场也很温和,另外像《新世纪文学的“同质化”倾向》《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》等等这些文章也切中了我们时代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,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,很有启发性。李建军的《当代社会分层与文学价值批判》,以前也读过其中文章,这次比较集中。从他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对贾平凹、莫言等著名作家的批评,可以看出李建军的勇气和立场,他有自己的坚定的世界观与文学观。但是对于他的一些观点,并不是很赞成,尤其是对一些作家具体字词运用挑的毛病。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他是应该可以有所创造的,尤其是大作家或者大诗人,他们应该会对我们惯常的语法和语言逻辑有所探索和突破,在这方面挑语病的毛病,以惯常的语法来规范和约束他们,既费力又没有太大价值,没有充分理解文学语言在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上可能有的作用。

总之我觉得这一套丛书,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家的风骨和力量,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界的良好生态,必将对“新时代文学”的到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。

文学批评更需要批判精神

□王秀涛

鲁迅曾在关于翻译这篇文章里提到,批评家要做“烂苹果”的工作,“把烂的剜掉,把好的留下来吃”。他认为,翻译的羸弱,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,但读书界和出版界,尤其是批评家,也应该分担若干责任。要救治这颓运,必须有正确的批评,指出坏的,奖励好的,倘没有,则较好的也可以。然而这怎么行呢,指摘坏翻译,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不要紧的,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,他就会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,甚至要你的性命。这现象,就使批评家不得不含糊了。鲁迅提出的两个问题,一是批评的伦理问题,指出坏的,奖励好的,一是批评家的困境和所受到的外界干扰,至今我们仍然还是讨论,说明这两个问题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。好处说好,坏处说坏,作为批评的准则,这是常识问题,但仍然需要不停地强调,今天虽然没有了鲁迅所说的别有来历的人的问题,但文学批评的干扰因素仍然很多,最主要的,就像鲁迅平总书记说的,不能因为彼此

是朋友,低头不见抬头见,抹不开面子,就不敢批评。这不仅是中国批评家的问题,国外也不能幸免。《小说面面观》的译者前言里提到,这本书的作者,英国批评家福斯特从来不惜为了友谊牺牲批评的,有三个例证:一是毫不必要的吹捧迪金森的《魔笛》;二是对伯西·卢伯克的两本书私下里颇不以为意,公开场合却尽是溢美之词;对一位国王学院的同学他也同样“表里不一”,就是因为这位同学在一次有关组织管理的争论中坚决支持过他;再有就是他出于个人理由决定不送给伍尔夫未经更正的校样,其中有一个对她作品的批评,他已经在校样上修正过了。福斯特明确过守守叛国也不肯叛友,人先于艺术是福斯特终生服膺并时常念叨的信条之一。

为友谊牺牲艺术,显然是违背批评的基本伦理的,但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鲁迅在《关于翻译》这篇文章提到的烂苹果的观点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。鲁迅烂苹果的含义其

实非常丰富,一方面,烂苹果最重要的把烂的部分去掉,不能给人吃,把坏的地方指出来,提醒读者,这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职能。另一方面,烂苹果就是要把好的部分留下,剜掉坏的以后,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对读者有益处。鲁迅这样说针对的是之前的批评方法,苹果有烂疤了,要不得,一下子抛掉。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,一点不看、一点不吃太冤枉,所以鲁迅认为,倘不是穿心烂,就说:这苹果有烂疤了,然而这几处没有烂,还可以吃得。这样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,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。因此一方面鲁迅的观点提示我们,缺陷和价值是可以并存的,批评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,另一方面我们应注意,鲁迅提出烂苹果的背景和前提是因为好苹果、好作品没有或者太少,所以不得不吃有烂疤的苹果,所以需要烂苹果,言下之意是如果好苹果多了,好作品多了,烂苹果自然就没有了市场,烂苹果的工作也就没那么急了。文学生产就是一个系统工程,好的作

迎合还是提升?

□刘川鄂

作家是审美价值的创造者,评论家是作家审美创造价值高低的评判者。在精神消费多样化、文学创作边缘化、文学批评更加边缘化的当下,批评文体驳杂、批评问题意识薄弱、批评的有效性普遍缺失。受作家出版社邀约,我的《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》论文集系列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系列,应该说,这套丛书是提升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重要尝试,以个人从事文学评论20年的经历,我认为批评家应该充分行使两只手的功用:批评家的左手,应该面向文本和文本创造,以人性和审美含量为尺度,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,帮助提升文本的创作水平;批评家的右手,应该面向广大读者,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。批评家不是作家和读者的附和者应声虫,而是审美世界的评判员!

当下文坛,评论家与作家的比例是极不对称的,中国各级会员作家约十万以上,而为圈内外称得上评论家的不超过数百人。职业评论家稀缺,批评家队伍质量参差不齐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也加大了外界对批评现状的不满。

2015年,我在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时,为了解对人围长篇小说的批评情况,我搜集查阅了数百篇相关评论。这些评论对作品题材内容和社会含量的分析花费了主要的笔墨,但对作品的艺术创造和审美缺憾却用力甚少,能够融合理性思辨力与文学感悟力、充分评判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出色评论实不多见。

我认为专门“烂苹果”这一类批评,就是以指出作家失误提醒读者提防失误的以否定意见为主的批评。针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,创作环境需要更加优化,作家的素养需要全面提升,读者审美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,有学理有胆识的锐批评特别可贵。鲁迅曾说过“批评必须坏处说坏,好处说好,才于作家有益”。净化批评环境,形成敢言直言的批评风气、壮大批评队伍、提升批评家的素养和学理训练,强化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是切实提高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途径。

《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》文稿的挑选和出版过程,亦让我有机会回顾十多年前直言批评某些作家的经过,这里面呈现一种批评史的意味。凭着批评家的良知、艺术感受力和厚积的学识,在发现作家作品的不足之后,批评家必须敢于直言。我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大都缺乏对话的能力,他们大都是凭借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来写作理解文学,不能像大江健三郎、米兰·昆德拉和略萨等作家一样有明确理性的社会观、人文观、文学观,能够与评论家和读者大众面对面交流的作家少之又少。我最初批评池莉时,她反批评我属于“酷评”,与她同在一个城市,却从未与她交流过,便出版了对她的批评专著。依照此说法,难道研究莎士比亚的批评家非要回到英国且穿越时空交流沟通吗?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,通俗文学和传统纯文学的边界混淆不清时,她的文学作品两边均沾,销量上大受欢迎。但是当现在通俗文学类型化,与纯文学的界限越发分明的时候,她的文学作品则优劣自现了。由两面讨好到两面不讨好,这就是池莉近20年的文学道路,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坛的变化。我当时对池莉的批评,是基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现象的思索,以人性含量和审美含量为价值尺度,展开的严肃批评。

新世纪文学批评问题依然明显,借助理论的过度阐释式批评、借文学现象对社会发言的借词言彼式批评、缺少学理的个人感想式批评随处可见。批评家应该审慎地思考和表达,以批判的姿态,做好“烂苹果”的工作,清理文学的消极表达,提升大众的审美水准。在如今的大数据新媒体时代,评论家更要坚守自己的价值尺度,不能够跟着媒体走,不能够跟着销量走,不能够跟着票房走。为什么在电脑和计算机的统计之外还要有评论家的存在?因为只有批评家才能对作家作品的精神创造高低做一个评判。你的使命不是迎合而是提升。